生命的重量

习 习

五月的一天，在南梁荔园堡列宁小学，我久久注视这张黑白照片。这个年轻女子，红军帽、齐耳短发、浓眉大眼、面庞饱满，她侧着头，安静地望着镜头。那一天，周围的人事、天气、声音、拍照片的缘由，都被滤去，甚至色彩，也只是单纯的黑与白。我忽然想起，去年五月的某一天，在山西，我也在瞻仰一位年轻的女子，她更年轻，叫刘胡兰，我甚至寻不到一张她生前的相片，想象不出她少女时的模样，只知道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十五岁那一年，那一天，面对刽子手，她喊出最后一句话：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清脆又刚毅的声音令刽子手胆颤，那一刻，乌云低沉，屠杀革命者的观音庙前，白雪茫茫。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中，从来不乏这样勇毅的女子。厚重苍凉的甘肃大地虽地处偏远，但春潮涌动时，革命形势一样如火如荼。在兰州，一九二〇年，少女邓春兰开天辟地、首破大学女禁，为中国女性争得受教育的权利；一九二六年，不畏牺牲侠肝义胆的秦仪贞成为中共甘肃第一位女党员；一九三六年，年轻的西路军女战士们前赴后继、血洒热土、感天动地……

而今，在南梁，看着相片中的她，站在她战斗过的土地上，时间仿佛也从远处拉到了近前。那天，我很想向更多人讲讲她的一生，她短短的二十九年的一生。有关她，尽管留在世上的只有点滴事情，但我想将它们连缀成线，而且，想让这条线长一些、再长一些。

她叫张景文，陕西人，生于一九〇六年。

一九三二年，张景文在西安女师学习。这年四月，戴季陶到西安举行所谓的“扩大纪念周”大会，中共陕西省委得知消息后，召集西安几个学校党团支部负责人秘密开会，主张学生们与戴季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十六日上午，各校师生五千余人集会，戴季陶公然发表反共媚外的谬论，张景文按捺不住怒火，和同学们纷纷质问国民党为何卖国求荣、镇压学生？戴季陶支支吾吾，想搪塞了事，学生们怒不可遏。戴季陶见势不妙，想偷偷溜走。眼明手快的张景文高喊一声，打！女生们拿起铜板、石板、石块、瓦片向戴季陶打去，戴季陶狼狈不堪，军警们企图镇压学生，学生们更加激愤，烧了戴季陶的汽车。第二天，张景文被捕，被捕的学生中就张景文一个女生，国民党要把她单独囚禁，张景文坚决不从，敌人无奈，答应先释放她，但她坚决要求：要关一起关、要放一起放。在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斗争下，被捕的学生被全部释放。

这一年，张景文二十六岁。因参加学生运动，张景文被学校开除。她的求学生涯在国难当头之时，结束了。

这时的张景文何去何从呢？

那一天，在南梁革命纪念馆，解说员向前来瞻仰的人们讲述了张景文被迫停学之后的经历。

一九三四年春，一心向往革命的张景文和丈夫徐国连，撇下襁褓中的孩子，带着秘密搞到的枪支，来到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开辟的陕甘边根据地——南梁（今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陕甘边区兴办了第一所红色小学——列宁小学。张景文和另外一名同志任教员。一九三五年十月间，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陕甘边根据地内部肃反时，张景文被错误地定为奸细，在中央红军抵南梁之前遇害，时年二十九岁。

——历史常常令人唏嘘不止。一个满怀革命理想、憧憬美好生活的年轻生命，戛然停止了。那天，南梁起风了，黄沙飞扬，树叶飒飒。

我望着张景文烈士相片上那安静温和的目光，感慨万端。

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想知道张景文到南梁后更多的事情。于是，我四处搜寻到一些资料，不多的资料，但让这个女子向我们走得更近了一些，她的样子更加生动了一些。

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这是留着“短毛盖”的张景文亲自编唱的一首信天游。

一九三四年，南梁政府成立后，这位当时在根据地不可多得的知识女性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

身兼重任的张景文深入乡间，和乡民们打成一片。开朗活泼的她深得乡民喜爱，她劝年轻姑娘们争取婚姻自由，劝她们放足，劝男人们剪去长辫子，她给大家讲穷人们受苦挨冻的根由。她还写得一手好字，双手同时挥毫，毛笔字好看大方。她带人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她用信天游的调子给乡民们编唱革命歌曲。在她的影响下，许多整天躲在家里的姑娘、婆姨们纷纷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张景文平时光脚丫，爱穿一双黑方口偏带鞋。一到乡民家，就光着脚板盘腿坐在炕上，群众和游击队员们都爱和她开玩笑，称她为“张放心”。当时，列宁小学的条件非常艰苦，教室是仅有的两栋破土房和一孔窑洞。没桌凳，张景文带领六十多个学生自己动手垒土台，支木板；没墨汁，就刮锅灰。张景文亲自编写教材，为使教材通俗易懂，把课文编成诗歌或顺口溜：“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左手拿碗，右手拿筷”，既学了文化，又提高了学生的革命觉悟。学校还开设军事课，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女教师张景文亲自示范。

在南梁山区，入学的大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这些贫苦的孩子们从未上过学，张景文耐心地给他们教汉字教算术，还讲革命道理。在生活上，她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慈母一般，衣裳破了她一针一线给缝补，手脸脏了她一把一把给洗净，有时，她坐在油灯下，仔细地抓孩子们衣服里的虱子。孩子们非常喜欢她、敬重她。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围剿”，张景文的爱人徐国连在一次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张景文得知消息后，强抑着悲痛，更加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一九三五年秋冬，在王明极左路线的残酷斗争下，西安到陕甘边根据地的同志们都错误地成为肃反对象，张景文被诬陷为白区来的“奸细”，二十九岁的她，被残酷活埋。

——叫人感慨万千的二十九年人生，可供记载的文字显得如此之少。

今天，在列宁小学，有一座洁白无瑕的雕塑，两个学生紧紧依偎着温和慈爱的张景文。

南梁回来，眼前一直浮现着张景文年轻的模样。

有一天，知道了一件事情，发生在张景文烈士牺牲很多年之后。

作家陈忠实先生在构思鸿篇巨制《白鹿原》时，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白鹿原当地的女英雄原型，有一次，他意外地读到一本叫《革命英烈》的刊物，里面有一篇文章，文章很短，讲述了一个女烈士的事迹，这位烈士就是白鹿原人，名叫张景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一位女战士，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之前她们不相识，关押的三两天时间里，她得知张景文成长在白鹿原某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她的经历，最后，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窑洞，之后被活埋。读完文章，陈先生“捶拳吁叹”。

于是，年轻英勇的张景文，这个令人崇敬的女英雄又得以重生，在《白鹿原》中，她以白灵的名字，在白鹿原勇往直前，继续着她向往的革命。

《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在文章中说：

“红军像彗星掠过中国西北的天空，而妇女所受的震动最大，她们从沉睡中觉醒，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她们面前。”

二三十年代，被几千年的历史压榨在生活底层的中国女性，大部分尚在蒙昧之中，但有这样一些女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觉醒，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她们就是张景文这样的女性，这些勇毅的女性，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虽像星星之火，但孕育着燎原之势。她们用单薄的身姿，在奠基，也在唤醒。

那一天，车过华池，看到路边封芝琴的家，那个当年的刘巧儿，也是革命思想熏染下的进步女性，她之前，有很多很多个张景文。

望着南梁深沉厚重的黄土地，我想，生命的重量到底该怎样掂量？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为了人类的光明事业，一些人，早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间停止了，但精神永存，且这精神一代一代教育着影响着后人，生命的分量因此而倍加沉重。

庆祝建党90周年文艺作品征文

中国文化报社 中国散文学会 主办

广州陈奕纯书画艺术中心协办

夜宿兰考

邓同学

夜宿兰考
听屋外的风儿在吼叫
风儿钻进树林
哗哗啦啦仿佛红旗在飘
旗帜就是火把照亮心灵的宇宙
我梦见焦裕禄在风雪中
去老乡家嘘寒问暖
记忆把焦裕禄塑成铜像
矗立县城的十字街头

踏上这一块土地
我追寻焦裕禄的身影
我问过乡镇干部
我问过县城的居民
我问过医院医生
我问过学校教师
我问过田里的老农
他们告诉我
在兰考人心目中
老焦没有死
千千万万个焦裕禄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
——共产党人

他当年亲手植下的泡桐树
成为“焦林”风景
成为地理坐标
不仅担负着防风固沙的重任
还是兰考人民的“绿色银行”
盐碱地已经变成沃土
生长出庄稼人的希望
兰考的农民富裕了
兰考的县城变大了
兰考的街道变亮了
兰考人说
没有焦书记就没有兰考的今天
改革开放的年代
把兰考打造成一个经典品牌
是时代赋予兰考人的重任

拜谒焦园
焦裕禄不仅是一个
县委书记的名字
而且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杆
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已化作一种精神
短短的475天
给兰考人民留下了一笔
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焦裕禄已经过时了
我要说 不
焦裕禄精神永恒

父爱般的亲情

王国能

二〇〇三年五月的一天，大清早母亲便给我打来电话，她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伯父陶斌源去世了！那段时间我正在江苏省宿迁做一个省重点工程的开工工作，接电话时，我刚从车上下来安排现场施工的事情。在母亲低沉难过的话语当中，我的大脑忽然一片空白，难以接受这个噩耗。酸楚和难过涌上心头，眼泪情不自禁地充满眼眶，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伯父在我的心里是位最清廉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慈溪做县（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兼主席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并曾经担任慈溪观城（现名为观海卫镇）油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观城区委委员、慈溪县（市）委委员、慈溪市人大常委、浙江省总工会常委等领导岗位，同时，他也是全国劳模。但伯父从不以官自居、以官为荣，以官谋利。记得小时候别人都羡慕我们有个当大官的亲戚，可在我眼里，伯父除了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外，还是位处处让人尊敬的长者，根本没有一点“官”的味道。他住的是几十平方米的职工旧宿舍，装修很普通。家里除了满屋子的书、字画和几个沙发家具外，几乎没有一件值钱的物品，就连一部电话机也是在他快退休时才装上的。

伯父虽然当官，但家境却不是很宽裕，伯母没有正式工作，一直在浒山镇三北市场摆小摊以维持家用，加之伯父工作繁忙，孩子只能由伯母照料着，很辛苦。单位有好几位同志和伯父说，为何不给伯母安排个工作呢？下属单位刚好有个空职，又轻松又能赚点钱，只要你一句话，我马上让伯母来上班。伯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我们不能以权谋私，你也不能徇私，我们要规规矩矩按照规定来。

伯父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在其位，谋其职，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老百姓，问得最多的是人民的心声，丝毫没有为自己谋过一丝福利，伯母甚至到退休年龄及至今也没能享受退休工资。他不为名不为利，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他的廉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是在他在任或卸任后，他的身上从来没有一套华贵显眼的衣服，也没有一双名牌皮鞋，一件白衬衫，一条灰布裤，干净、清爽，就像伯父自己说的，就是要干干净净做人，干净利落办事。

记得我毕业时，伯父刚从任上退二线，我被安排到城里工厂工作，离伯父家很近，于是便经常到伯父家蹭饭吃。伯父总会买来一二个我喜欢吃的菜，并亲自下厨做几个精致可口的小菜。每每，他总是叫我先吃，然后他还要带点饭菜给在三北市场摆小摊的伯母送去……

伯父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勤奋好学，在学习上能不耻下问，更写得一手清秀端庄的好字。在任何时候，伯父从不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若遇到不懂或不清楚的地方，定会虚心向别人请教。伯父的为人处事总是很低调、很和蔼、很公正。我虽然没有到他工作过的地方去感受过，但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佐证。他总是在饭后让我坐在沙发上耐心地教导我为人处事的一点一滴：做人要正直善良、忠孝勤俭，做事要勤奋细心、无畏无愧。他也从不袒亲偏故，为熟人谋事谋利，我就是一个例子。但在我心里，他是我最好的最伟大的榜样。

我在城里工作了十多年，伯父家就成了我的家，我和伯父建立起父子一样的感情。他的大公无私、正直不阿、两袖清风的形象给我的人生打上了烙印。

二〇〇一年年初，为了生计我离开家乡慈溪到千里之外的苏北工作。临走时，伯父千叮万嘱，要我虚心学习、工作，鼓励我快乐、坚强地面对生活，为自己和家庭开创美好的未来。他说他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要有颗快乐平常心！他从小相册里拿出一张在溪口照的相片，并在背面写上祝福。说他的身体还好，退休了自己可以养花写作做家务、做做老年或关心下一代工作，不要挂念。

在江苏工作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回家，甚至有两年没回家过年。忙碌的工作让我少了和伯父的联系，只是在节假日时打个电话问候老人家一下，并说说自己的近况，让老人家放心。伯父听到我说的好消息，也总是很开心。

一转眼，伯父已经走了整整八年，我却没有到坟前去看过他一次。但我总会时时拿起那张珍贵的相片细细端详，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回忆他给我父爱般的亲情、回忆他给我人生的激励和关怀！

今天匆匆为伯父写下这篇纪念文章，只是想让伯父的思想如松柏常青，流芳我心！

电话声声佳音传

蔡忠海

持续几月的干旱令父亲愁眉不展。前段时间，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因为干旱，花生一直种不下去，家里的二亩水稻更没指望了。因为没水，稻秧一直插不下去。

昨天刚吃过晚饭，就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村里的干渠修通了，这下可好了，田里的秧苗有救了……”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在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帮助下，村里年久失修的干渠总算疏通了，水库里的水顺利流到我家责任田里。今年的水稻有希望了，难怪父亲如此高兴。

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这些年一直是一个人待在老家。多次劝他到城里来同我们一起住，他总是待不了两天就吵着要回去。我们只好随他。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天到晚总喜欢在田间地头转悠，成天不停地收种小麦、水稻、花生、蔬菜等作物。我们劝他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穿，您年龄大了，干不动体力活，不如就种下菜园，只当锻炼身体。可他总是笑着说，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种田有补贴，这么好的田地如果荒芜了，那可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祖宗呢。

我们劝不了父亲，只能由他。他喜欢待在乡下，只要他过得好就行。

父亲一个人待在乡下老家，平日难免有些孤独，我们只能经常打打电话，关心问候一声。因此，电话成为我们了解农村信息、了解父亲最新状况的最好工具。

只要老家发生什么新鲜事，就可及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

几年来，父亲在电话中总是喜讯频传。

“家里的有线电视安装好了。哈，这下我的时间好打发了，没事可以看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五十多个频道任我选，想看哪个就看哪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了。”那是五年前秋天的某日，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的好消息。

“村里修了水泥公路，都通到家家户户门口了。这下可好，下雨的时候就不用走泥巴路了。以后，你们买了私家车，就可以将车开到家门口。”四年前初夏的一天，父亲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

“家里的自来水装好了。这下可好，吃水的大问题解决了，不用去河里担水了。”那是前年初春的一天，父亲报来的喜讯。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和你妈的养老保险办好了！从这个月开始，我和你妈每月总共可以领到二百多元养老金，可以为你们减轻一些负担了……”这是去年春天的某日，父亲再次报来的喜讯。

今年春节回家，遇见儿时的伙伴忠友，看到他脸色浮肿，精神萎靡，我劝他去看医生。他张开嘴，欲言又止，然后低垂着头，叹了一口气。原来，忠友患了脑肿瘤，去年家里建了新房，多年的积蓄全花光了，哪还有钱治病呢。前不久，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幸亏有了“新农合”政策，这次住院费、医药费总共花了十多万元，按照规定，国家给他报销了八万多元医疗费用。他在电话中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新农合”，我这条命早丢了。真该感谢党的好政策啊！

电话中频频传来的好消息，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高兴的是，现在农村每年都有新气象、新变化，城乡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每次回乡，我看到党的富民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效果越来越明显，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真可谓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父亲呢，他的晚年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真的是“农夫生活比蜜甜”。

碾（版画） 尤凤 作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文艺作品征文专号

雨花台上“九”的遐思

庄小燕

多次去过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也多次引起心灵的震撼，唯独这次再去瞻仰，却被一个数字激发起无尽的遐思，那就是“九”！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难以计数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壮烈牺牲在雨花台。新中国成立后，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人，党和政府兴建了雨花台烈士陵园。陵园自北向南的一条中轴线上，依次有大型群雕、纪念碑、纪念馆等主体建筑，以其庄严恢弘的气势和层峦叠翠的景色，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场所。

我来到位于陵园北门广场的中央，这里高耸着一座烈士就义群雕。这里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杀害革命志士的地方。群雕由一百七十九块花岗石粘结雕成，是由分别代表工、农、兵、知识分子和报童的九尊塑像组成的整体。

我又怀着敬仰肃穆的心情，来到长长的纪念碑廊。纪念碑廊位于纪念碑护墙内侧，东西各有九十块黑色磨光花岗岩，上面镌刻着由国内三十六名书法家手书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论》三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面对这九十块含意非凡的花岗石碑，我忽然心头一动：九！又是一个“九”字数据……

再往前行，我来到了雨花台主体建筑烈士纪念馆。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位于雨花台主峰，是一“凹”字形中西结合的现代建筑。东西展开长九十米，南北伸展宽四十九米，建筑面积五千九百平方米。馆名由邓小平题写。门庭南北有“日月同辉”的花岗石雕。馆内经一九九九年重新布展，共展出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牺牲、安葬在雨花台的一千五百一十九位烈士的英勇斗争事迹和文物。

又一连串接踵而至的九字，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九”是阿拉伯数字个位数中最大的数值，也是我们的生活天天都要打交道的数字。然而曾几何时，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大家用得最多、也最喜欢的是八！不错，八也好，“发”也罢，但我们怎能轻易忘记了这九字？疏忽了这一串串、一组组足以使来这里的人们灵魂涤荡与震撼的九字？

是设计者的匠心独运，还是建筑时的偶然巧合？此时此刻已无需探索研究。因为面对这一串串非同一般的九字，已引发与激荡起我层层涌动的沉思与遐想——

是的，长眠在这里的革命先烈，正是你们当年胸怀着九江八河的九曲回肠，以敢上九天揽月与九死未悔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了我们今天的“八”或“发”，与敌人展开了持久不息、九死一生的殊死搏斗，从而换来了我们幸福美满的今天。

九，是你们当年拯救我们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个个高举的坚定的拳头，是你们面对敌人屠刀时一个个高昂的头颅，也是你们发出的“救救中国”急迫而又愤怒的吼声。

今天，我们伟大的党一路披荆斩棘，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九十年的光辉历程。我相信，面对如愿以偿的今天，你们一定会含笑于九泉之下。

安息吧，英雄们！安息吧，烈士们！